

本刊92年10月號(總第13期)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甚麼放棄新民主主義?〉和〈紅衛兵運動的兩大潮流〉後,讀者反響熱烈。這表明讀者(其本身常常也是研究者)十分關注當代中國問題的理論探討。而在經商熱潮衝擊下的中國大陸學術界和文化出版界的現狀,同樣令人矚目。

——編者

## 經濟大潮衝擊下的出版界

你們大概已知道近幾個月經濟大潮衝擊下文化界的震動。國內出版界可說正處在一種解體性裂變中。現行的出版發行體制早已山窮水盡走到了頭,可萬萬沒想到堤決水潰會這麼快!由京城多家出版社首發的「個人承包責任制」迅速遍及全國多數省份。以貴州人民出版社為例,書號按各編室人頭分配(包括校對、編務、財會人員),每人四個書號(教育社每人八個、科技社每人十個),實行所謂「編印發一條龍」包幹到底,允許突破分工範圍組稿,關鍵是要求年終結算時完成上交純利潤13,000元,超過部分個人與社二八分成。

這樣一來,經濟效益成了出版的首要(乃至唯一)槓桿,編輯們化整為零,人自為戰,鑽頭覓縫,四方出擊,找尋適應廣大俗眾興之所在的「熱門暢銷書」。

現在賣書號不僅合法,而

## 三邊互動

## 三邊互動

## 三邊互動

且書號大掉價了。

出版社全面企業化勢在必然,但目前這種搞法將導致假冒偽劣產品充斥的圖書市場何等局面?!置身這「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的「轉型期」,理論學術著作空前受冷落,偏是一點痴心不解,確令人有「共誰盟白水,愧我乏青銅」之嘆!不過,我是寧可甚麼也不幹,退居斗室,與書為伴,也決不會去弄幾個書號,參加這大合唱的了。

讀者 貴州

92.12.13

## 是統購統銷關閉了市場經濟之路

我很注意金觀濤近幾年發表的大塊文章,因都是潛心研究之作,頗值一讀。當然見仁見智,也有一些不同意見。如「馬克思主義儒家化」、「中國烏托邦傳統」之評述,我便覺得似是而非,不能苟同。但總第13期的〈中國共產黨為甚麼放棄新民主主義〉中好些看法則極為贊成,並認為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中共50年代以來之左傾,與當時如何處理對待社會現實問題的具體決策,當

然直接相關。其中,「統購統銷」確為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重大關鍵。因為正是它開始從根本上關閉了市場經濟之路,我一直視它(而不是農業合作化或三大改造)為歷史的某種轉折點。正如不是毛逝世或四人幫垮台而是林彪事件是思想史上的某種轉折點一樣。中外史家似多未重視這些關鍵環節。

金、劉文且具有方法上的意義,即不能僅以毛的個人思想來解說歷史。毛與中共其他領導人(如劉、周等)雖確有潛在的不同思想傾向,但在具體的政策決策上,最終並無原則的思想分歧,這一直包括到文革發動期。

不過,50年代以來中共領導層之所以採取或接受如此這般的政策、決策,又仍與(1)蘇聯社會主義樣板的存, (2)長期戰爭中形成的革命觀念、傳統以及當時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一般認識和向往, (3)毛個人思想的「發展」三者直接有關。正是此三者使中共從不自覺(如「統購統銷」)和自覺(與「統購統銷」幾乎同時的「總路線」和隨後的三大改造)兩方面都「自自然然地」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綱領。這在當時有

其「必然性」的方面，卻正是歷史和思想史的真正悲劇所在。

李澤厚 威斯康辛州

92.12.18夜半

## 應從整體精神現象 來分析文革

十月號中〈紅衛兵運動的兩大潮流〉一文，資料翔實，述評真切，能跳出以往文革研究的政治路線鬥爭史的窠臼，但作者在撰寫中仍似有顧慮和思想限制。

文中認為，是文革的一套「理論」和「機制」使「人們互相廝殺」。事實上，文化大革命貌似反傳統，卻從未脫離傳統。敵對觀念和極化的人際關係，原本是中國傳統中老之又老的傳統，如「朝為座上賓，夕為階下囚」，如「既生亮，何生瑜」等，中國歷史上的政權轉移和交替，從來沒有和平過渡。近、現代中華民族由於利益集團的劇烈分化，形成死不相容死不相讓的政治鬥爭，體現在政黨之間和政黨內部各派別的以兵血相見的權力爭奪。在文革中，在政治核心或稱權力核心中的這種你死我活的內鬥之風，蔓延到社會底層，便是群眾鬥群眾，鬥起來心狠手辣，不置人死地絕不甘休。固然，這種「社會時尚」與文革領導人和四九年後的政治運動領導人的鬥爭精神分不開，但也與中國文化缺少了文藝復興所倡導的人道主義和人文精神分不開。

因此，文革研究應該擺脫僅僅從政治學的角度，從特定的政治環境就事論事地進行研究的狹隘方式，應從民族、整

體精神現象和文化意義上來分析文革現象。不應忽略這樣一個事實，文革中，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是文化大革命分子。不應把現代中國社會政治的動盪全歸咎於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能在中國掀起大瀾，這本身便與民族的價值意向和精神追求有關聯。因此，反省文革的主體人物應是人民自己，而不應該僅僅是幾個已死去或有關的政治領導人的罪錯。史學界應該有一種勇氣，奠定一種人民常犯錯誤，人民會自己坑害自己的基本觀念。現在應該是結束中國人善於推諉責任的傳統的時候了。

湯本 洛杉磯

92.11

## 不要忽略文革中大規模 群眾性迫害

貴刊第13期印紅標先生〈紅衛兵運動的兩大潮流〉一文，點出了國內外文革研究中一個至今被忽視的問題，即群眾分派的明顯利益關係。50年代末60年代初，「階級路線」日益等同於「家庭出身」，在大中學校甚至小學校的學生中造成重大裂痕，班級成為階級鬥爭的直接場地，家教對學業的影響也使嫉妒化妝成「階級感情」。由於升學、分配、升職、前途均受制於「階級路線」，這矛盾早晚會演化成社會危機。文革只是提前給這危機一個意外兇暴的爆發機會。至今文革研究者沒有重視這個比「迫害老幹部」血腥得多的大規模群眾性迫害。從聯動對「黑五類」同學酷刑毒打起，到遇羅克被處死刑，為保衛既得利益而施

的暴行一再被掩蓋搪塞，潛化為我們民族心理的重要創傷。印紅標先生的文章第一次正面觸及這問題，功不可沒。但我們還需要更大劑量的治療，更切中要害的解剖。

趙毅衡 北京

92.12.6

## 最獨特的實驗文體家

《二十一世紀》先後推出兩篇朱大可的文章，是獨具眼光的。朱大可稱得上是當今中國最獨特的實驗文體家之一。他滲融了後現代主義的哲學敘述文體與先鋒派詩歌的語言精粹，再加上雄厚的中國文化底氣作為「後盾」，創造了獨一無二難以模仿的「朱大可語體」。他的新語體激活了不少優秀文學青年的文化創造意識。朱大可在文科大學生中擁有相當數量的愛好者，這正證實了他的先鋒性活力所在。因為對於未來文學發展趨勢的準確預測往往並不是來自於業已形成的學術圈子，而是來自於處在緊張創造狀態中的青年一代。在這個意義上，朱大可閃着靈光的手指確實是指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新文學的。我們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觀點，但對他的天才性語體獨創則應予以應有的注意。對於第6期所載楊國榮君論王國維的文章，我則有些不同看法。似乎還是用英國經驗主義和德國唯心主義之間的分歧來概括王國維的思想矛盾較為精當。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在西方兩大思想流派中經常是兼而有之，比如王國維崇拜

的康德就是一個例子，所以不能人為地製造「對峙」。

胡河清 上海  
92.12

## 中國哲學與現代科學相通嗎？

讀了貴刊上李慎之先生的筆談〈中國哲學與二十一世紀〉，及楊綱凱先生的討論文字，覺得很有意思。李先生文章好，他登在《讀書》雜誌上那一篇對馮友蘭先生的回憶，我讀了好幾遍，感到體貼入微，舒服極了。但在貴刊的這一篇談話，有些觀點我也認為不對。將中國哲學的某些說法，與現代科學直接比對，等量齊觀，這種做法現在似乎很時髦。

我覺得楊先生劃清「兩個領域」，斷定「中國哲學與現代科學並不相通」，是很對的。更可貴的是，作為科學家的楊先生，並不搞「科學一層論」，他斷定中國哲學與科學不相通，恰恰是要抬舉中國哲學，嚮望中國哲學在二十一世紀解決科學所無能為力的諸如「人的地位、價值的標準」等困惑人類的大問題。

我今想提出的一點愚見是：在劃清中國哲學與現代科學的界限之後，是否可進而（或曰「反而」）再思考一下將它們溝通的問題。楊文為「劃清界限」故，強調科學關心「小問題」。但另一方面，確實也有關心「大問題」的大科學家，如愛因斯坦。似乎還不能說「只關心小問題」是科學的必要特徵，否則便不是科學了。歷史上的科學革命，即使最初由小問題引出，終必導致大問題的

提出和解決。不知甚麼緣故，我對愛因斯坦總感到親切多於尊敬，他不僅崇高，而且溫柔，溫柔得使人忘記了他的崇高，因而使我們中國人也敢於認同。如果說「人」與「學」不當距離太遠的話，那麼，有愛因斯坦其人，則作為其學的科學，中國文化也應能與之融洽，當然這決不是機械對應，牽強比附。

陳克艱 上海  
92.12.31

## 我們的錯誤和道歉……

第14期楊綱凱〈中國哲學與現代科學〉一文，頁142作者簡介中「現任物理學講座教授及系主任」為「現任物理系講座教授及理學院院長」之誤，謹此致歉。

## 更改地址 / 郵誤通知單

### Notice of Changes in Address/Lost Mailing

新地址 New Address: \_\_\_\_\_

郵誤 Subscribed/Complimentary copy lost in mail:  
右列各期未寄達 Issues lost: \_\_\_\_\_

請貼上姓名標籤  
Please attach mailing label of your subscription

姓名 Name: \_\_\_\_\_

日期 Date: \_\_\_\_\_

請寄回： 香港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二十一世紀  
Please send to: Twenty-First Century Bimonthly, CUHK, Shatin, Hong Kong.